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王阳¹ 朱计翰²¹

(1.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74; 2. 巴塞罗那大学 08001)

【摘要】: 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鸿沟”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问题, 一是找准突破口和关键点, 对数字化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老人等群体采取定向财政扶持, 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 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是以城市群为重点, 引领区域合作, 增强城市群对内辐射、对外联动的作用, 开辟促进共同富裕的区域合作道路; 三是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 提升农村地区“新基建”的发展速度,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共同富裕 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22)03-0104-009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 我国数字经济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2020 年, 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以 9.50% 的增速增至 39.2 万亿元, 对 GDP 贡献率增至 38.58%, 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分别提升至 8.90%、21.00%、40.70%。作为信息时代产业赋能的手段, 数字经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但若数字经济发展过快, 也可能在就业保障、区域发展、公共服务、平台监管等方面导致一定的消极作用, 从而对促进共同富裕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 选择契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 充分发挥其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有效规避其不利冲击, 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与历史脉络梳理

(一) 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

贯穿“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逻辑主线是“三个新”: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 在“十四五”规划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表述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共同富裕, 是契合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1. 契合协调与共享理念, 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

协调是共同富裕的外在表现, 协调发展奠定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它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包括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和行业协调。其中, 城乡协调强调缩小城镇、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将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区间; 区域协调强调我国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共进, 不让任何地区掉队; 行业协调强调各行各业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 要形成开放、公平的行业竞争环境。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共享发展是“全民、全面、共建、渐进的共富”,^[1]旨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包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2021 年, 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下一步将聚焦乡村振兴, 着力提高城镇化率。从现实情况看,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在 2020 年达到 63.89%, 预计在 2050 年达到 71.20%, 但仍未企及发达国

作者简介: 王阳,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朱计翰, 巴塞罗那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硕士研究生。

家 80%的城镇化率水平，共享发展任重道远。面向全体人民促进共同富裕，有利于贯彻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2.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国内国际双循环并非“有内无外”或“有外无内”，国内循环是基础，国际循环是延伸，两者相得益彰，共促发展。在需求方面，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截至 2020 年末，人口总量达到 14.2 亿，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 30%。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国内需求市场进一步扩张。在供给方面，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2020 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874 万，2021 届增至 909 万，在中高端人才储备上仍有优势；我国是拥有联合国确定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有工业大类 41 个、工业中类 207 个、工业小类 666 个，这夯实了供给体系的基础。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挥内需潜力和供给能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可以实现供求动态化均衡，解决好各类“卡脖子”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共同富裕，能够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带动消费、扩大内需，能够提升劳动人口工作能力，增加社会总产出。这些都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3.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相互统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一方面，共同富裕是涵盖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富、公共服务改善的全面富裕，以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体现。促进共同富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2]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民生福祉达到更高水平。

(二) 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脉络

促进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大致历经 4 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 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改革之初，在农村地区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全面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一系列面向农村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释放了经济发展活力。农产品产量显著增加，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与工业产品价格差距逐渐缩减，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异军兴起的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村地区产业、就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1984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652 元、355 元，虽然收入之差从改革开放前的 210 元增至 297 元，但收入之比从 2.57 降至 1.84。在以农村地区为经济改革重心的阶段，经济转型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控制。

第二阶段(1984—2003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84 年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快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85 年，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4]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改革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地区经过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先富起来”，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2002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702 元、2475 元，收入之比首次超过 3，达到 3.11；2003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8472 元、2622 元，收入之比增至 3.23。在以城市地区为经济改革重心的阶段，城市发展逐渐摆脱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闭束缚，而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于城市地区，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三阶段(2003—2012 年)，城乡统筹发展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2003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同时统筹城乡发展。虽然我国在 21 世纪之初总体已到达小康生活水平，但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依然很多。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通过积极改善农村地区的治理结构，着力改变贫穷落后的村容村貌，解决好“三农问题”。^[5]2006 年，为了进一步协调城乡发展，我国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财政支出，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城乡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达到农村地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 1%的发展成绩。^[6]2008 年，为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从全局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我国提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7]2012 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我

国农业农村发展迎来了“黄金期”，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措施的提出与实施，缓解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09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7174 元、5153 元，收入之比为 3.33，此后呈现收入增长但收入之比稳步降低的趋势。至 2012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4564 元、7916 元，收入之比降至 3.10。在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第四阶段(2012 年至今)，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保障。^[8]通过积极引进产业、开展技能培训等举措，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9]伴随着城市户籍政策的改革，农村劳动力获得了更多外出就业的机会。截至 2020 年底，外出就业的农民人数超过 1.7 亿。2020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3834 元、17131 元，收入之比持续下降至 2.56。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城乡关系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二、数字经济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一)数字经济的缘起

1940 年，二进制和计算机诞生。1994 年，数字经济(DigitalEconomy)首次见诸报端，出现在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的一篇报道中。^[10]1995 年，唐·塔普斯科特出版的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以数字经济为标题，详细描述数字经济的各方面情况，自此数字经济正式形成专有概念。^[11]1996 年，尼古拉斯·尼格鲁庞蒂将数字经济界定为“利用比特的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模式可划分为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两个阶段，其中数字经济也可称为电脑经济、比特经济，而与之相对的传统经济分别称为人脑经济、原子经济。1998 年，OECD 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得到了全球广泛认可，即“以电子方式捕获、传输和显示数据信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组合”。^[12]

进入 21 世纪，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各国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我国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6 年在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创新增长的路径，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13]2018 年，由数字经济论坛、阿里研究院、毕马威推出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强调数字经济在补充、融合原有经济体系的同时，实现了基于底层的深刻变革。2021 年，我国“十四五”规划认定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为重要动力，以提高实体经济数字化水平、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及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为目标的经济形态。

(二)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1. 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数字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对经济增长构成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仍持续扩大至 39.2 万亿元(图 1)。数字经济的稳步增长奠定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有序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2. 数字经济贡献水平显著提升

2020 年，全球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贸易发展低速增长，物价水平大幅波动。叠加疫情冲击，经济发展面临沉重的下行压力，全球经济增长乏力。^[14]然而，我国数字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从未停滞，且增速始终超过同期 GDP 的增速(图 2)。2020 年数字经济增速达同期 GDP 增速的 3 倍有余，有效缓解了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与此同时，数字经济

占 GDP 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27.04% 增至 2020 年的 38.58%，增幅达 11.54 个百分点(图 3)。可见，数字经济贡献水平显著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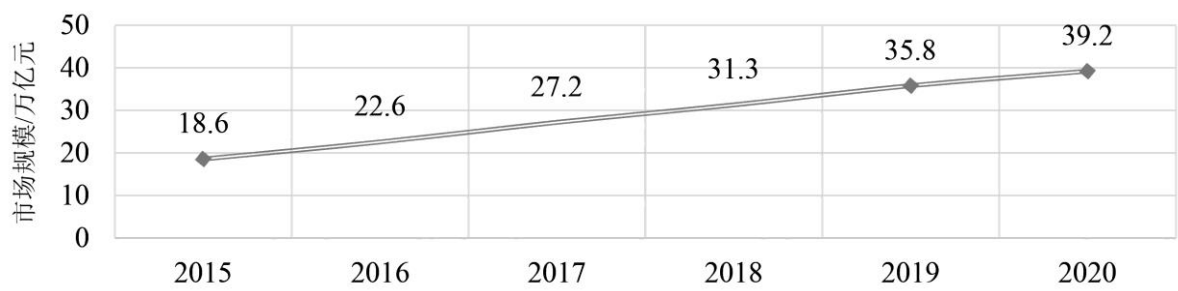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2 2015—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与 GDP 增速的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统计局。



图 3 2015—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对 GDP 的贡献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统计局。

3. 数字经济的渗透率逐年提升

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优化传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支点。从数字经济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第一、二、三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分别从 2016 年的 6.20%、16.80%、29.60%，提升至 2020 年的 8.90%、21.00%、40.70%（图 4），多年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尤以数字经济在第三产业的渗透率增幅最大。第一、二、三产业数字化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表明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逐渐向深层次融合，助力各行各业跨越数字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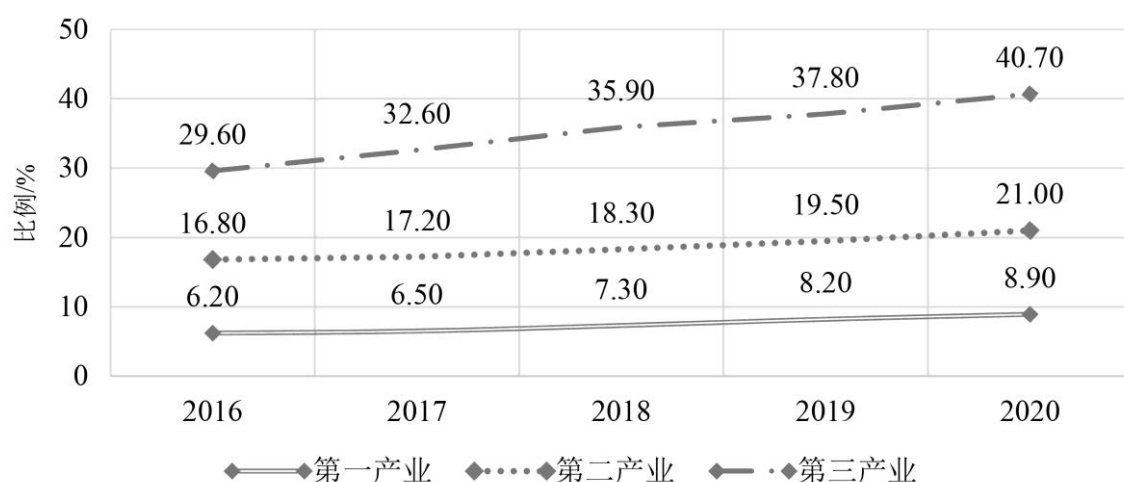


图 4 2016—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三）数字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

1. 产生就业促进效应，提升技能水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就业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带动劳动力需求增加。同时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伴随着产品和服务支付价格降低，消费者收入增加，刺激消费者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带动就业发展，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广化效应。二是人工智能逐渐替代简单的劳动力需求，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来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易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特别是在市场开放环境下进入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化效应。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张，倾向于替代程序性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在不断进步的技术浪潮中，中低技能水平要求的就业岗位逐渐消失，创造出更高技能水平的知识密集型岗位。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直接造成流水线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而涉及专业性思考、复杂性对话的非程序性劳动，如创意类工作者、技术类工程师很难被取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结构向更高技能结构调整，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2.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协调发展

农村地区是共同富裕的“洼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是农村发展的新引擎，它带动技术、资金、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可有效推进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技术的快速创新与应用，为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并逐渐渗透到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是数字经济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赋能。农村地区基于共享数据，依托资源优势，形成了区域专业化生产布局。二是数字经济为改善农民生活赋能。农民通过社交网络、在线平台等渠道，将特色农产品与服务、独特的农村自然风光和资源宣传出去，推动了当地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同时，数字经济改变了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休闲、社交方式，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共同富裕深度契合协调与共享两大发展理念，其中包括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和行业协调。从区域协调发展看，数字经济以颠覆性信息技术为核心，突破地理区划限制，成为各区域培育新动能的突破口。长三角率先依托数字经济推进区域一体化，已形成跨区域的配套产业链，未来将继续推进区域全链接闭环，具有标杆示范作用。其他地区也积极依托数字化渠道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尤其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数字经济是突破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限制的重要推手，为缩小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从行业协调发展看，在传统经济背景下，经济活动的交易、物流、技术、营销各环节都面临一定的成本压力，各行各业准入门槛较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与供给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介入经济体系，成为激活市场资金、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的有序运行使企业在日渐开放、趋向公平的环境中拥有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使经济活动的各项成本降低。数字经济在逐步建立并完善线上市场的同时，也优化了线下营商环境，使更多民众积极投入创业致富活动中，从而推动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

3. 弥补公共服务短板，平衡公共设施供给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平等、有效性不足、获得感不够等问题，数字治理有助于构筑保障民生的基线与改善民生的高线。数字治理提高了政府服务能力，通过规则数字化、材料数据化，实现政务服务的全过程可视化。以信用数据代替主观评价，以智能机器推进自动化服务，进一步实现政务服务的精准直达。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智慧农业和“城市大脑”，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中，逐渐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嵌入政府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技术应用空间的不断扩大，数字产业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数字经济可促使公共设施供给更加充分、平衡。社会民众能否公平享用数字基础设施，关系到其能否均衡享受公共设施，也关系到其能否在当前及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也可享受数字基础设施，与相对富裕地区和城市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不再是“高谈阔论”，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4. 完善线上声誉机制，推动线上交易发展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拥有大量累积的数据，依托数据资源形成的线上声誉机制逐步取代线下口碑机制。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线上声誉机制具有反馈评价、信用评级作用，消费者能够通过信号甄别与搜索机制，对各平台商家的线上声誉进行了解，从而为自身的行为决策提供参考。^[15]虽然目前存在部分入驻线上平台的企业以人为操纵方式刻意刷好评或恶意刷低分的现象，但由于线下口碑多流传于口头而非客观数据或文字传播，更具有随意性、易篡改等特点，相比之下，线上数据的真实性更高。伴随着线上评分用户和数据的增多，线上声誉机制不断完善，其可信性也逐步提高。尤其在区块链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线上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线上声誉机制对线上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通过线上声誉机制，利用信息反馈，能够建立起一个双向互动、平等交流的声誉信息网络，对线上交易具有促进作用。^[16]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线上交易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增加了民众创造财富的可能性。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普惠

金融为更广泛的民众提供获得更多外部资源和服务的机会。在电子商务红利下，农民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在线上销售农产品，农产品销售渠道得到拓宽，致富方式也更为丰富。数字经济赋能金融服务做活、做优，发挥出“金融活水”^[17]作用，推动线上交易发展，加快经济转型与升级，促进共同富裕。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

（一）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

虽然数字经济产生了促进就业的效应，提升了就业者的技能水平，但对贫困人口、低技能人口的就业仍造成了冲击。^[18]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2030 年我国将有超过 2.2 亿名工人在职业转换之间下岗或再就业，约占总数的 30%，其中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将会下降 18%。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多中、高技能需求的就业岗位，但明显倾向于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这就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就业红利”；而对低技能劳动者，极强的替代效应会导致其面临失业风险。如何使低技能劳动者得到有效的保护，避免失去劳动收入，是完善就业保障的关键。与此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尚未健全。快递员、网约工等“零工经济”从业者工作时间长、任务琐碎、条件艰苦，普遍没有“五险一金”，难以得到劳动法的有效保护，甚至在一些互联网“大厂”盛行“996 是福报”“商务活动强制陪酒”等不健康的企业文化，严重侵害从业者的身心健康。新业态从业人员也是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其权益保障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缩小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造成冲击。

（二）“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数字经济时代，智能手机普及范围不断扩大，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仍有一部分人不能利用网络进行消费或生产。数字普惠对城市地区居民缩小“数字鸿沟”的效果明显优于农村，对年龄处于 60 岁以下群体的效果明显优于 60 岁及以上群体。^[19]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强调普惠，但如何避免“数字鸿沟”下的“边缘人”问题，尤其是在老年人对互联网接受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是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考量。如果不能消除“数字鸿沟”，难以紧随信息时代潮流的人将会被时代抛弃，无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协调发展是过程，而非已经实现，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差距，区域协调与均衡发展任重道远。库蒂尔(Couture Victor)等(2021)基于对中国农村电商的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中国电商进入偏远农村地区，突破物流屏障，刺激当地消费，但并未提高当地农民实际收入，也并未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活动，因此数字经济促进均衡发展这一论断并无有力证据。^[20]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区域创新产出，但发达地区在发展初期受益颇多，欠发达地区只有在政府实施数字普惠政策之后才能逐渐受益，区域差距缩小是漫长的过程。^[21]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空间不平衡特点，基于数字经济的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也呈此态。由于很强的市场黏性，先发者率先占领市场后，后发者难以望其项背，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挑战。

（三）与公共服务管理不匹配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央及地方多级政府积极投入“城市大脑”“互联网+政务”“智慧养老”等领域，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公共服务管理的高效化发展。在建设政务云平台、开发在线管理系统与应用的同时，难免会出现系统设计冗杂、人员各自为政的问题，导致政府工作人员手机上所安装的公务软件冗多，反而限制了公共服务管理水平的提高。此外，政务云平台的运行数据主要来自各地人口、法人、自然资源、空间地理、经济运行等数据，侧重规划统计数据和年度统计数据，从整体看，数据更新频度低、实效性不足。尤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时，政务云平台的应用短板也暴露无遗。例如，在追踪识别无症状感染者、潜在病毒传播人群的过程中，系统割裂、协同性差、信息孤岛等问题与按需管控、靶向治理、精准识别等现实需求难以匹配。

（四）数字平台面临垄断风险

线上交易发展是时代趋势，但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滋生线上交易风险的重要因素，尤其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使得市场资源配置失衡，进一步制约了线上交易的健康发展。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势必要在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开展。^[22]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其监管相对宽容，为其提供相对宽容的政策环境，使得诸多数字平台企业迅速成长起来、从业者和投资者先富起来。但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垄断、无序扩张等问题日渐突出，这既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汇聚了海量用户的数字平台，由于双边互动市场、边际成本递减特征，极易出现流量垄断现象，对公平竞争环境造成不利影响。^[23]加强监管是维护数字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数据安全、改善创新生态的基本条件，全面规范的监管是数字平台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只有如此才能切实维护公众的基本权益，迈向更高质量共同富裕。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选择

（一）完善就业保障体系

针对就业社会保障不健全的问题，积极做好非知识技能型劳动者及新业态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工作。一是为低技能人员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思维和技能，建设数字化学习平台体系，构建能动学习的良好环境。二是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就业吸纳优势，培育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发挥数字平台载体的支撑作用。强化数字人才培养，加大基础学科投入，推动产教融合和有机衔接。将就业保障贯穿始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二）多措并举消除“数字鸿沟”

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鸿沟”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问题，多措并举消除“数字鸿沟”。一是找准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数字化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老人等群体采取定向财政扶持，全面拓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让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数字化所带来的便利，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二是以城市群为重点，引领区域合作。通过发挥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突破地方行政壁垒，增强城市群对内辐射、对外联动的作用，开辟促进共同富裕的区域合作道路。三是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提升农村地区“新基建”的发展速度，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提供新动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三）推动公共服务质效的提升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管理不匹配的问题，积极推动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一是明确公共服务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契合我国发展实际的道路。二是精准分析民生需求，加快“城市大脑+未来社区”“健康大脑+智慧医疗”智慧场景建设，打造数字经济公共设施供给的综合应用场景，促使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更广泛的地区延伸，使得相对落后地区也能实现优质共享。

（四）全面规范数字经济的监管

针对数字平台存在垄断风险的问题，全面规范数字经济的监管。一是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完善数字治理和监管法律，严格依法监管。制定分领域、分行业的法律规定作为监管治理的红线，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完善数字经济监管组织体系，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通过监管人才的培养，注入人才活力，消除监管重叠或盲区现象。三是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特征、规律等相适应的监管规则，加强包容审慎监管，为规范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四是运用先进监管技术，提升平台监管水平和效率，防止借数字平台“东风”进行不正当竞争。

参考文献：

-
- [1]曹克亮.全面理解共享理念与共同富裕[J].前线,2021(11):65.
- [2]李景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J].党政研究,2021(1):5-13.
- [3]余淼杰,曹健.新发展格局中的共同富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
- [4]文建龙,金瑶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深刻涵义及其时代价值[J].邓小平研究,2017(4):11-19.
- [5]田永胜.统筹城乡重在以城带乡[N].光明日报,2004-03-08.
- [6]李源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观照[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3):92-94.
- [7]魏礼群.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J].政策,2009(3):17-21.
- [8]蔡萌,岳希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1):36-44.
- [9]檀学文,李静.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深化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7(9):2-16.
- [10]李长江.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初步探讨[J].电子政务,2017(9):84.
- [11]TapscottD.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New York:Mc Graw Hill,1996.
- [12]OECD.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 New Perspective[M].Paris:OECD Publishing,2014.
- [13]马化腾.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14]朱险峰,吴瑞雪.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发展与价格走势——基于历史的比较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9):13.
- [15]李磊,宋建伟.线上声誉机制构建及其影响效应:一个文献综述[J].新疆财经,2020(4):24-31.
- [16]王小宁,李琪.声誉与保障机制对网上交易的影响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9,31(6):108.
- [17]潘锡泉.促进共同富裕需发挥“金融活水”作用[N].金融时报,2021-11-08.
- [18]Faulhaber Gerald R..The Internet Trap:How the Digital Economy Builds Monopolies and Undermines Democracy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9,57(2):444-447.
- [19]刘魏,张应良,王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J].经济管理,2021,43(7):44-60.
- [20]Couture Victor et al.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Evidence from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nsights,2021,3(1):35-50.

-
- [21]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21(6):67-78.
- [22]刘诚.数字经济监管的市场化取向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5):35-42.
- [23]李勇坚,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J].改革,2020(8):58-67.